

[19] 参见《原道觉世训》，收于《太平诏书》，见《太平天国印书》上册，16~22页。

[20] Thomas H. Reill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p.93.

[21] 太平天国出版刊物中，可见魔鬼作为邪恶之代表，其称谓约有40种。夏春涛将这些称谓表列在其书中，见《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76~77页。在太平《三字经》中采用了“魔”，“鬼”，“邪”，“妖”，“蛇魔”，“阎罗”，“阎罗妖”及“红眼睛”。

[22]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138页。

[23] 同上书，41页。

[24] 《太平天国印书》，下册，515页。

[25] 同上书，574页。

[26]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117页。

[27] 同上书，62页。

[28]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正》，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9] 有版本作“鍊”。

[30] 吴经熊在《圣咏译义》中使用“锻炼”(11:5; 17:3; 26:2; 66:10; 105:19; 139:23) 取代和合本诗篇中之试验(11:5)、试炼(105:29; 139:23)及熬炼(17:3; 26:2; 6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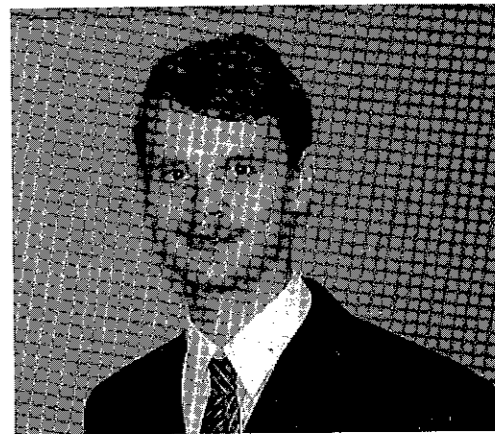
[31]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137~138页。

[32] 《太平天国印书》，下册，761页。

[33]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22页。

[34] Thomas H. Reill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p.97.

中国艺术在俄国与俄国的中国风：17—18世纪中俄文化交流史一隅*



白若思

白若思 (Rostislav Berezkin)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引言

俄国人很早就开始接触中国艺术。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艺术在俄国宫廷及贵族群体间风靡一时。18世纪，“中国风”(Chinese style)在俄国盛极一时——对于“中国风”，人们更熟知的是它的法语名字“中国风格”(Chinoiserie)以及对应的俄语翻译“中国时尚”(kitaischina)。此时的欧洲掀起了沉迷于中国艺术品的大潮，而俄国的“中国风”构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一现象在俄国也体现出自己的特色，从而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类似风尚区别开来。

17—18世纪，中国艺术对俄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其中的原因：那段时间刚好是俄国发展国力和扩张领土的阶段，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呼之欲出。200年间，俄国在政治、科技以及文化方面创新频频。重要的是，俄国对中国艺术的兴趣既成为开拓中俄贸易陆路的原因之一，也最终促成了两国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正式建立。从另一角度而言，中国艺术也影响了18世纪俄国的装饰和绘画艺术的发展。本文将讨论的是中国艺术品在俄国风行的特征，及其对该国文化艺

术的影响。

时至今日，对中国艺术品在俄国的流通及其影响做出的研究寥寥可数。那些研究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中国风”的成果往往对同一时期俄国的相关情况只字不提。^[1]而那些涉及俄国“中国风”的研究往往又没能正确把握它的历史。例如，在一部关于欧洲“中国风格”的雅科布森(Dawn Jacobson)权威研究(俄译本在2004年出版)中有这样一句话，“德国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Ekaterina I)和叶卡捷琳娜二世(Ekaterina II)使中国风在俄国的贵族群体间流行了起来”^[2]。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问题：首先，叶卡捷琳娜一世并不是德国人，而是属于立陶宛(和波兰)族裔。最重要的是第二点，俄国人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在叶卡捷琳娜一世(1684—1727)于1724年成为皇后之前就开始了。在中国学者近年的相关研究中，也没有谈到俄国对中国艺术的收藏和模仿。^[3]

在其他语种中，出现了一些重点讨论俄国之“中国时尚”的文章，但通常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分而视之。例如，英国学者玛格斯(Barbara Widenor Maggs)在自己的代表作

中讨论了中俄交流在18世纪的俄国思想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对物质文化带来的影响着墨不多。^[4]俄国学者菲舍曼(Olga L. Fishman, 1919—1986)在她的著作中主要讨论13—18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往来以及中国在欧洲的形象,也谈到了俄国“中国风格”的物质层面影响。她的学生将她未能完成的文稿进行整理,并在她过世后很久,也就是2003年出版。^[5]这本书的重要贡献在于成功地将俄国的“中国风格”作为欧洲整体潮流的一部分进行了分析。但是,菲舍曼采用的材料并不全面,这也成为该书未能完成的重要原因。例如,她注意到中国对俄国建筑的影响只在18世纪中期有所体现(位于圣彼得堡的斯莫尔尼[Smolny]大教堂的钟塔)。^[6]而我们现在可以确定,这种影响在18世纪的前期即已初见端倪(见下文)。最近,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萨摩伊罗夫(Nikolai A. Samoilov)教授也在中俄文化交流的语境中就中国艺术品的使用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7]然而,他使用的材料极为有限,原因在于,他没有引用很多近来出自俄国艺术史家之手、介绍新发现艺术品的那些成果(见下文)。与此同时,在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他们简要介绍了中国艺术在俄国的历史和影响;然而,此类研究在材料范围和历史来源方面都非常有限。^[8]

如此说来,俄罗斯的本土研究也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该国的历史学家通过使用历史资料来研究中俄关系,而往往忽略了实物。同时,俄罗斯的艺术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国内丰富的中国艺术收藏和中式建筑,特别是圣彼得堡附近的沙皇夏宫建筑遗迹:彼得宫(Petrodvorets)、奥拉宁鲍姆宫(Oranienbaum)和沙皇村(Tsarskoe Selo)。这些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学者——如亚历山大·伯努阿(Alexander N. Benua, 1870—1960,

著名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乌斯宾斯基(A. Uspenskii)和依可尼可夫(A. Ikonnikov)——都将这些皇宫里中式的亭台楼阁看作是18世纪俄国自身宫殿艺术风格的展现(受到欧洲潮流的影响),而未将其放在中俄关系的背景下进行研究。^[9]同时,苏联时期的俄国艺术史家对中国的装饰性艺术着墨甚少,因为那时的大环境往往忽略这种艺术。20世纪后半叶,一些俄国艺术史家讨论了17—18世纪的皇宫内部装饰中采用的中国艺术品,以及它们在那一阶段的中俄贸易往来中所处的位置。^[10]然而,这些成果仍有缺陷,依然局限在既有资料的范围之内。我们可将2000年以来的俄罗斯本土研究按照研究方向分为两类:第一,为俄罗斯博物馆所藏的中国艺术品列出清单,依照俄国沙皇、贵族的珍藏品原件进行复原;第二,将那些和18世纪的俄国如何获取及使用中国艺术品情况相关的档案文件整理出版。在第一类中,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缅希科娃(M.L.Menshikova)、阿纳波娃(T.B. Arapova)和库德里亚夫采夫(T.V.Kudryavtseva)等来自圣彼得堡的艺术史家们的研究成果。^[11]他们的研究同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在近几年内举办的几次中国艺术展览有关。第二类中,我们应该留意博罗蒂娜(N.Yu. Bolotina)的研究。^[12]20世纪也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艺术在俄国的发展史的档案文件。^[13]尽管如此,仍然没有出现能够将实物证据与历史材料结合起来、从而讨论俄国的中国艺术历史及其影响的综合性研究。本文拟通过使用多种材料对这个话题的主要方面进行探讨。

一、早期交流以及17世纪俄国的中国艺术

中俄交流史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中期。那时,两国都是蒙古人的天下,甚至有那么一小段

时间,二者均从属于蒙元帝国的版图。^[14]13—14世纪,中国艺术品在金帐汗国——蒙古人在现属俄罗斯的领土上建立的一个国家(其中心在伏尔加河流域)——非常出名。那一时期,金帐汗国成为了中俄文化交流的纽带。被俘的中国工匠在金帐汗国的城市里劳作,随之而来的如陶瓷、丝绸和金属制品等中国工艺品在该国闻名遐迩。^[15]金帐汗国的艺术影响了同一时期俄国金属制品和其他装饰性艺术的发展,因此很多工艺和图样都由中国传到俄国。^[16]

15—16世纪,中国艺术品进入俄国,其主要消费者来自高等社会阶层。俄罗斯商人尼基汀(Afanasii Nikitin, 1472年去世)曾在1466—1472年游历印度和中东国家,他写了一本游记《游于三海之间》(Puteshestvie za Tri Moria),该书也提到了中国。该记录非常具有代表性。尼基汀在对中国的地理位置作出一些记录之外(他在书中把中国称为“Hatai”——对契丹[Katai]的误用),他还说这个国家“出产瓷器,物价低廉”^[17]。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商人对奢侈品更感兴趣——欧洲人也是如此,而瓷器身处其列。那个时期的一些中国艺术品都被保存在俄罗斯博物馆中,比如一个来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军械库的中国制造的瓷瓶(苏勒亚瓷)。这个瓷瓶曾经的主人是伊凡四世(伊凡雷帝, Ivan [Ioann] the Terrible, 1533—1584)的儿子和继承人伊万诺维奇(Ioann Ioannovich, 1554—1581)。^[18]

欧洲和俄国贵族消费者对商品兴趣促使俄国官方开始探索通向中国的贸易陆路。16—17世纪,中欧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依靠印度洋航线,路程既漫长又危险。16世纪时,俄罗斯占领了之前属于金帐汗国的西伯利亚,从而将领土扩张至蒙古边境。那时,蒙古与明王朝既是邻国又是敌人。同时,欧洲商人和探险家们希望抓住机会开拓商路,经由新近扩张的

俄罗斯和蒙古从陆上到达中国。但俄国政府不希望外国人取道自己的领土,他们想独占通向中国的陆路。^[19]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第一批使节前往中国。1618年佩特林(Ivan Petlin)——托木斯克的哥萨克,受托木斯克军政长官之命带队去了中国内地;1654年俄罗斯中央政府向中国派出了大使巴依科夫(Fedor I. Baikov, 约1612—1663);两个使团都到达了北京。^[20]第一个使团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新陆路,第二个使团的目的是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以及直接的贸易往来。二者均从属于现代欧洲国家派往中国的最早一批外交使团之列。不幸的是,巴依科夫的使团并没有达成既定的主要目标。尽管如此,这些俄国行者收集了很多关于中国及抵华的线路信息,并为沙皇政府撰写了十分详细的报告:佩特林编撰了《中国、罗布泊地区及其他定居和游牧民族的国家,游牧人的营帐,鄂毕河,还有河川与路途的记录》(“Rospis” Kitaiskomu Gosudarstvu i Lobnorskomu, i inym gosudarstvam, i zhilym, i kochevym, i ulusam, i velikoi Obi, i rekam i dorogam);巴依科夫提交了此次出使的官方记录(Stateinyi spisok)。这些文字包含了关于中国的地理、生活和文化的有趣信息,以及中俄之间的陆地(西伯利亚和蒙古)情况,因此引起了西方学者和商人的巨大兴趣,很快即被翻译成西方语言出版,广为欧洲各国所知。但在俄国,这些作品都还处于手稿阶段(各自都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寂寂无闻。^[21]然而在那时,关于中国及其商品的消息固然已以口头方式在俄国流传开来。

俄国第一批驻华大使对贸易比较感兴趣。比如,佩特林在上述作品中提到了自己在中国看到的不同商品,包括天鹅绒和各种丝绸。他注意到,边境城市缺少珍贵的玉石。^[22]他也简要描

述了中国的建筑,包括北京的皇家宫殿及其镀金屋顶。^[23]巴依科夫也对那些昂贵的织物(丝绸)、珍贵的玉石和珍珠极其感兴趣;他甚至提到了当时汉巴里(北京)的织物的价格。^[24]他对于皇宫的描述比佩特林更加详细,言及精雕石柱、桥梁和池边的栏杆。^[25]第一批出使中国的俄国人显然为中国艺术和商业的发展而感到震惊。

自那时起,俄国官方使团、信使和商人定期前往北京。1618—1825年间,至少有9个官方使团出访北京。其中大部分人都抱有通商目的,并将中国的艺术品带回俄国。例如,1675年驻北京的俄国使团由斯帕法里(Nikolai M. Milesku-Spafarii, 1636—1708)领导,他是罗马尼亚裔,曾任莫斯科大使部的书记员。虽然他出使中国没取得什么成绩,但是在增进俄国对中国及其文化的了解方面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26]斯帕法里带回了中国康熙皇帝(1662—1722)送给俄国沙皇费德尔·阿列克谢维奇(Fedor Alekseevich, 1676—1682在位)的礼物,包括“带全套挽具的中国马鞍,重八十两的银盆和盥洗架,总计30件各色绸缎和天鹅绒,加上5张海豹皮,5张海狸皮,5张雪豹皮和4篮茶叶”^[27]。来自中国皇帝的礼物——中国马鞍由镀金铜制成,上有二龙戏珠图样,现仍保存在莫斯科克里姆林的军械库中(见图1)。^[28]马鞍上还覆盖着一片金银相间的刺绣织锦。这是两国在那一时期和平关系的重要象征。

中国的织物、特别是丝绸在那一时期非常受俄国人珍视。它们主要被用来制作贵族和神职人员的衣物和教堂用具。俄国的东正教会非常看重奢侈品,于是中国丝绸成为那时的教会法衣、窗帘和圣像遮布的原材料。例如,来自俄国的中国艺术史家缅希科娃提到了在罗斯特夫(一个靠近莫斯科的城镇)克里姆林博物馆



图1 中国马鞍——康熙皇帝的礼品(17世纪)

中收藏的两件丝制艺术品,其时间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期:一件由绿色丝绸制成的法衣和一块绣着仙鹤图样、用来遮挡圣像的绸料(最开始是中国的官服标志,名叫“补子”)^[29]。17世纪中期,中俄贸易在俄国的边境城市中发展起来,丝绸等贵重的中国商品——特别是金银制品、珠宝、陶瓷和漆器——成为其中的主要商品。茶在俄国的中心城市并不流行,但西伯利亚的本地人很需要茶叶,所以这种商品也被进口到了俄国。在俄国,用来和中国商品交换的主要是动物毛皮,这是中国富人青睐之物。将中国商品带往西伯利亚的有中国商人,还有中亚商人(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城)。17世纪末之前,他们都是中俄间的主要贸易纽带。^[30]

1689年,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俄间的常规贸易关系形成。这一条约主要处理的是中俄边界的管理问题,但也涉及双边贸易问题。它允许一国公民自由进入对方领土并开展贸易。^[31]然而,那时的中俄贸易的地点仍然集中于俄国的边境地区(尼布楚和色楞金斯克)。虽然由于极端气候和政治限制,贸易开展并不顺利,但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持续发展。在彼得一世(彼得大帝,1682—1725在位)统治期间,中俄贸易发展迅速。

二、18世纪初的中俄交流和艺术品

彼得一世宣布自己是俄国的第一位皇帝。他的名望主要来自他对俄国政治、军队制度的改革和对俄国西方化与去宗教化的领导。同时,他也非常关注中俄贸易的发展。他年纪尚轻时,名义上与自己病弱的哥哥伊凡·阿列克谢维奇(Иоанн Алексеевич, 1682—1696)一同当政。1692年,他向中国新派出一批大使,该使团的领导人是伊台斯(Everard Ysbrands Ides,生于1660年,卒年在1704—1709年之间)——一位在俄国服役的丹麦(更可能是荷兰)商人。这次出使的主要任务是同中国达成进一步商务协定。^[32]中国皇帝康熙对伊台斯和他的同僚以礼相待,1694年在自己的宫室内接见了他们,并且同意继续发展中俄贸易。但是,他只允许俄国使节和商人来华,而中国商人不得进入俄国境内。^[33]

1704年,伊台斯的旅行日志在荷兰出版。其中,他记叙了自己的中国经历,并对那些在中国皇宫和北京官员府中所看到的珍贵器皿和艺术品(漆器、陶瓷、绘画、刺绣丝绸窗帘等)作出详尽的描述。^[34]伊台斯写道,在中国的富庶府邸中,食物都是被盛在陶瓷盘子里端上来的。在通州县,他看到一个陶瓷市场,并且注意到那里的商品质量上乘。^[35]伊台斯把中国的很多艺术品和商品样品带回俄国。他1695年返回莫斯科时,受到了彼得大帝和伊凡皇帝的接见。他向他们汇报说,中国皇帝对中俄协定非常满意,俄国及其商人能从对华贸易中获得丰厚利润。^[36]

伊台斯使团为俄方争取到中方的积极态度,于是17、18世纪之交,两国贸易迅速发展。那时出现了一些前往北京的商队,这些商队由俄国政府派出,体现出国家组织的形式。俄罗斯学者斯拉德科夫斯基(M.I. Sladkovskiy)致力于研究中俄贸易史,在他看来,中俄两国在17世纪都获利不少。^[37]彼得一世使中俄贸易由国家

垄断,因为他发现这样可以为俄国财政带来巨额收入。1697年,俄国国家贸易垄断将貂皮和银狐皮纳入其中,而这些最昂贵的皮草商品在中国极为畅销。^[38]1707年,彼得一世颁布了特殊法令,规定中俄边境贸易由国家控制,禁止对华私人贸易。^[39]然而,对华私人贸易一直延续到18世纪并且采取多种形式。^[40]而相关国家垄断一直延续到1762年。施拉科维奇的研究还发现,在此期间有17个国家组织的商队从俄国去往北京。^[41]这些商队由西伯利亚部组织,成员不仅包括商人,也包括若干政府职员、1位军官和约100名哥萨克人(士兵)。18世纪初,从莫斯科到北京需要花大约两年时间的旅程,且路途艰险。商队要穿过一些无人居住亦无官府管辖的区域,很容易遭到土匪袭击,因此武装保卫必不可少。根据1694年中国皇帝的谕旨,俄国商队抵达北京的人数不能超过两百。^[42]

1715年,俄国驻北京东正教团成立,驻地设在俄罗斯北馆——20世纪,这里成为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该传教团增进了中俄贸易和文化交流。俄国东正教团在彼得一世的积极干预下形成,主要任务并不是传播东正教福音,而是培养汉语和满语的翻译和学者,协助中俄外交和贸易联系。^[43]它为俄国的外交职能服务了很多年。位于北京城南的俄罗斯南馆则为俄国的贸易商队和外交人员提供居所。

在18世纪初,通过俄国商队进口到中国的商品仍然以动物毛皮为主,而中国出口到俄国的商品包括丝绸等织物、瓷器、银器、玉石、漆器以及各种茶叶和大黄。^[44]这些奢侈品在双向贸易中比重甚大。很多中国艺术品就在那一时期被进口到俄国。

彼得一世个人非常喜欢中国艺术品。这首先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他自幼即对之熟知。同时,他在1697年游历欧洲国家时,观察到那

里对中国艺术的痴迷之后就对中国艺术和器皿更加感兴趣了。他在欧洲看到了中国艺术品，并在回国之后就自己开始收集。例如，在他于荷兰（1698年3月1日）写给自己的部下和朋友维尼乌斯（Andreas Andreazon Winius, 1641—1717）的信中，他提到维尼乌斯答应从莫斯科给自己寄来中国的金盏，但是他认为这些东西在国外一无是处，因为“他在莫斯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里这么多的中国艺术品”^[45]。

彼得一世及其皇室成员会使用中国商品，特别是丝绸等织物。这些商品由西伯利亚部官员呈送到皇宫（见图2）。他们控制着对华贸易，直接从由中国回到西伯利亚的商队处购买商品。一些档案提到了这些商品被送到皇宫的过程。比如说，1708年的一份档案提到了一条绣有金线的中国丝毯的运送过程。^[46]另一份可以追溯到1712年12月的档案记录了中国丝绸被送到叶卡捷琳娜一世（Ekaterina Alekseevna）房间的过程。^[47]她是新晋皇后，彼得一世去世之后，她在1725—1727年统治俄国。^[48]那时，人们普遍使用丝绸来制衣或饰墙，彼得一世也曾穿着由中国丝绸制成的衣服。^[49]而我们对于叶卡捷琳娜一世的那些丝绸的使用情况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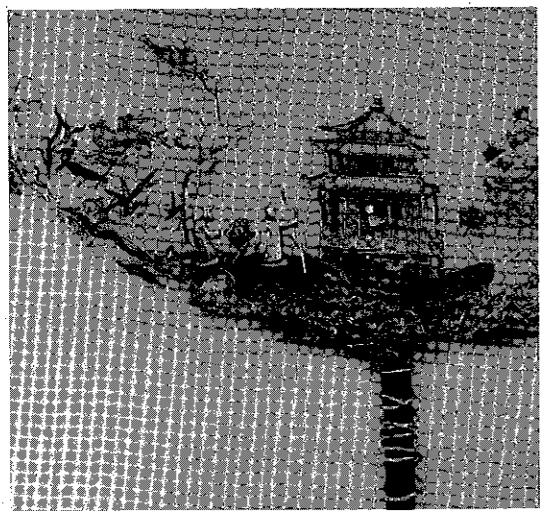


图2 彼得一世收藏的中国簪子（16—17世纪）

彼得一世经常让随行商队的官员和使节们携带中国商品回来。例如，1715—1716年，一支由沙皇组织、由洛伦茨·郎喀（Lorents Lange, 1690—1752）带队的使团的任务之一就是为他带回中国的奇珍异宝。^[50]在沙皇所需要的东西中，还有一种要铺在彼得霍夫（彼得宫）夏宫炉壁上的瓷砖。这些瓷砖非常少见，要由中国皇帝特批才能买到。据西伯利亚部长加加林（Matvei Gagarin, 约1659—1721）的记载，这些在中国制成的瓷砖于1717年被运到俄罗斯的境界。^[51]大使伊斯梅洛夫（Lev Ismailov, 1685—1738）也曾在1721年到访过北京，他的任务是购买用于彼得皇宫墙面上的中国挂毯，这在1719年的档案中有记载。^[52]这项任务也得到了中国皇帝的特批。1722年3月19日，彼得一世写信给郎喀——他那时作为俄方代表尚留在北京，提醒他要将那些商品带回俄国。^[53]

郎喀出生在瑞典，被委任为信使前后随多个外交使团前往中国。1721—1722年，他当过伊斯梅洛夫（Ismailov）使团的书记员，1726—1728年曾经是拉古辛斯基（Sava Lukich Vladislavovich-Raguzinskii, 1669—1738）使团的一员，1736年陪同俄国东正教使团的神父们一起回国。彼得一世去世后，上述第二个访华使团成行。他们的贡献是在1727年签订了《恰克图条约》（Kyachta Treaty）。该条约部分条款为中俄贸易作出新规定，并允许在北京建立俄国东正教堂。这个新条约在18世纪进一步推进了国有贸易的发展。因此，郎喀六次出访北京，并留下了详述他北京之旅的日记。18世纪晚期，这些日记在欧洲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俄语。^[54]

像郎喀这样的俄国使节经常提到他们在中国见到的艺术品。^[55]比如，在郎喀的《中国社

会结构论》（*Description of Chinese state and its formation*）中就有一整章（第十章）内容讲述中国的科学与艺术，其中提到中国在纺织、制陶、冶金方面的成就。^[56]在俄国外事及商队人员的传播下，俄国对中国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郎喀将大量中国艺术品带回俄国，其中很多都被存入“艺术房间”（Kunstkamera）博物馆（好奇之室）。那是俄国首个公共博物馆，由彼得大帝下令在1711年建成（现在是圣彼得堡人类学与民俗学博物馆）。遗憾的是，一些由郎喀带回的艺术品或在1747年那场博物馆大火中被焚毁，或后来流失。好在18世纪30年代，俄罗斯科学院的画家们以相册绘画的形式将大部分中国艺术品收藏留存了下来。^[57]

至于那些彼得大帝在1719年指定的挂毯，俄国学界长久以来都认为就是冬宫博物馆那些带着男孩嬉戏图样的缙丝，均由伊斯梅洛夫从北京收购带回（见图3）。但最近，缅希科娃发现这些艺术品被带回的时间可能更早（17世纪末），由前期某个俄国使团带回，说不定就是伊台斯使团。^[58]彼得大帝的中国挂毯中也有几条以仙鹤起舞为图案。这些东西价值不菲，它们见证了中俄国统治者间友好关系的发展。我们还会发现，18世纪初期，流入俄国的中国艺术品数量惊人。其中很多东西属于中国“外销商品”，即专门给外国人制造的商品，它们在俄罗斯塑造了“异国的、神秘的”中国形象。^[59]

三、1700—1725年俄国的中国艺术品

17—18世纪之交，被带到俄国的大部分中国艺术品都用在了皇宫的内部装饰上。它们也影响了那时发展迅速的俄罗斯本土美术，特别是装饰性艺术和建筑。那一时期中国艺术品及图样按照其主要用途形式可以被归为三类：（1）将中国艺术品置于西式建筑内收藏和展



图3 彼得一世收藏的中国缙丝（约17世纪末）

览。（2）以一种模仿中式的方式进行室内设计。（3）以“中国风”建造个体建筑。第一种装饰形式是俄国最早也是最常见的使用中国艺术的形式，时间上可以追溯到17世纪。17世纪后半叶，皇宫墙壁经常用中国的丝绸装饰，世纪末时则采用锦缎挂毯。^[60]中式的室内装饰在18世纪前半叶出现，并且在接下来的百年间持续存在。同一时期，中式房屋结构也出现了，但是直到18世纪中期仍寥寥可数（见本文第五节）。

在彼得一世的皇宫里就可以看到很多以第一种方式运用中国艺术的实例。首先，如上所述，他是第一批收藏中国艺术品——比如陶瓷、漆器、银器、景泰瓷、象牙和石雕——的俄国人之一。部分艺术品就在他的皇宫里展出。现存这种装饰形式的早期实例之一位于圣彼得堡夏宫博物馆（建造时间约在1712年）的客厅内，那里有一个摆有中国艺术品的陈列柜。

当时那些和彼得一世关系紧密的人以及杰出的政治家——比如勒佛特（Frants

Lefort, 1656—1699)、缅希科夫 (Aleksandr D. Menshikov, 1673—1729) 和布留斯 (Iakov V. Brius, 1669—1735) ——也收藏中国艺术品。早期收藏中国艺术品数量最多的是缅希科夫, 他是彼得大帝的密友、军队总司令, 也是新都圣彼得堡的第一任市长。彼得大帝去世后, 他在 1725—1727 年成为实质意义上的俄国统治者。无人不晓他收受贿赂。缅希科夫明显是那时俄国最富有的人, 因此他在圣彼得堡的宫殿——由意大利建筑师在 1710—1714 年建成——成为那时俄国最宏伟壮观的建筑之一。缅希科夫收藏的很多中国艺术品至今仍保存在他的宫殿。^[61] 1727 年他被免职和流放之后, 收藏品被查抄。缅希科夫的夏宫 (始建于 1711 年, 落成于 1727 年, 此后不久缅希科夫即被流放) 在圣彼得堡附近的奥拉宁鲍姆, 同样非常奢华, 珍藏中国艺术品。然而, 这座宫殿的原始内饰在缅希科夫倒台后被毁掉了。但是当读到那份记录着缅希科夫在莫斯科和纳尔瓦的房子里被充公的中国艺术品的清单之后, 我们还是会叹服于其藏品的丰富。^[62] 这份清单内容包括瓷器、由丝绸等织物装饰的物品以及家具 (漆器), 总计 22 件。^[63] 重要的是, 这份清单里提到了几卷挂在墙上的丝织物, 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草 (也可能是花)”图样, 这在当时被广泛地应用于墙壁装饰。缅希科夫在圣彼得堡的宫殿和夏宫的收藏显然比这份短短的清单里面提到的要多得多。彼得大帝的另一位部下布留斯也是一位外籍富人, 收藏了大概两百件中国艺术品。^[64] 1735 年他去世以后, 这些物品都被收入俄罗斯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中。

俄国的第二种“中国风”即为以中式风格装饰房间, 这也始于彼得一世的皇宫。例如, 在他位于彼得宫的私人小皇宫——法文名为“我的享受” (Monplaisir) ——中, 有陶瓷室

和漆器书房, 这些都是俄国早期“中国风”的典例。^[65] 西方和俄国的学者注意到, 这些房间追随的是西方、特别是德国同类内室的中式风格。^[66] 然而, 它们由俄国的艺术家装饰, 具有俄国特色。陶瓷室由真正的中国瓷器装饰 (那时的俄国工匠无法制造瓷器), 而书房墙上的装饰漆板则出自俄国艺术家之手。^[67] 他们努力模仿中式风格, 并且显然以真正的中国艺术品、例如屏风上的图案为蓝本, 同时加以想象描绘出中国风景与人物。1941—1944 年, 法西斯国家占领了彼得夏宫, 使这些工艺品毁于一旦, 但这个房间里的漆板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重建, 现在得以展出。在 18 世纪的俄国, 这种“漆器书房”风格在宫殿内饰中风靡一时。后来也出现了类似的例子。(见本文第四节和第五节)

丝绸在 18 世纪初成为随处可见的墙面装饰。例如, 我们最早可以在彼得大帝的夏宫和缅希科夫位于圣彼得堡的府邸中见到这种装饰。后者的几个房间的墙面上挂着中国丝绸和挂毯。至今基本保存完好。它们虽然曾被在宫室间移动, 但仍可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格。^[68]

第三种“中国风”, 亦即在宫殿建筑中采用中国主题也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时期。最早的例证就是缅希科夫在奥拉宁鲍姆的夏宫里建造了所谓的日式亭阁。其复杂的穹顶设计显然受到了那些刻画在真正艺术品上的中国和日本建筑图案的启发, 与同时期中国的花园亭阁相似 (见图 4)。该穹顶的设计本意是用来展示中日瓷器, 但实际情况并非所愿 (在府邸落成后不久, 缅希科夫的家人被迫离开)。同样的穹顶结构出现在了府邸另一侧的教堂上, 这是一所家庭教堂。在府邸的整体风格上, 这一结构与另一日式屋顶设计相得益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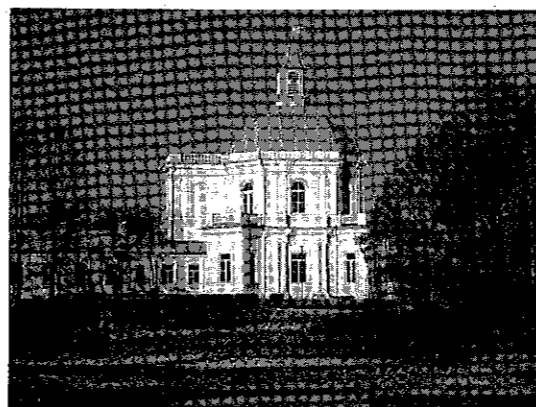


图 4 奥拉宁鲍姆宫 (Oranienbaum) 缅希科夫宫殿的日式亭楼 (1720 年代)

四、1726—1761 年俄国的中国艺术

1725 年, 彼得大帝去世。此后, 俄国人继续收集中国艺术品、进行“中式书房”的装饰。如上所述, 1727 年的《恰克图条约》为边境上的中俄贸易作出新规定, 允许在边境城市尼布楚附近成立恰克图特别贸易区。^[69] 俄国商队继续以三年一次的频率往来于中国。从此, 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的重镇, 国家派出的商队途径此地。^[70]

那一时期, 由中国进口到俄国的商品种类增加了。棉制品——通常被叫作“kitaiika” (中国织物) 以及“daba” (由中国的“大布”而来) ——在俄国的需求量开始增长。和丝绸相比, 它们价格更低, 对于中产阶级群体来说更能接受。至 18 世纪中期, 对华贸易已经对俄国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 在从中国带到俄国的货物中, 奢侈品和艺术品仍然比重甚大。国家派出的商队主要为宫廷需求服务, 而国家对多种货品的垄断在那一时期仍在继续。^[71]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形成的在俄国宫殿中如何使用及模仿中国艺术的那三种方式也延续了下来。

彼得大帝过世后, 他的侄女安娜·伊凡诺芙娜 (Anna Ioanovna, 1730—1740 在位) 和他

的女儿伊丽莎白 (Elizaveta Petrovna, 1741—1761 在位) 成为统治俄国的女皇。她们也继续与清朝保持着和平关系。她们都向中国派遣出新的使团。18 世纪 30 年代, 安娜·伊凡诺芙娜还接待了两个中国使团, 讨论土尔扈特回归中国的问题。^[72] 两位女皇都喜欢中国艺术, 自己也收藏些中国艺术品, 包括丝织品、挂毯、瓷器、珠宝以及金属制品。缅希科夫发现, 其中部分物品是清廷送给俄国女皇的礼物, 部分由驻北京俄国大使购买或定制。它们都被保存在了冬宫博物馆。这里有用绿玻璃制成的 (仿玉) 中国茶杯, 附有金色杯盖 (上有钻石装饰以及安娜·伊凡诺芙娜姓名的首字母); 以及上有双头鹰图案 (俄国国徽) 的瓷盘, 饰有彩色丝织刺绣的白缎毯子 (也有双头鹰图案)。^[73]

由彼得大帝收藏、后来被存入圣彼得堡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中的那些中国艺术品在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此后, 在 1753—1756 年随国家商队去往北京的易拉奇博士 (F.L. Elachich) 接到命令要收集一些相似的艺术品来重现彼得大帝的收藏。他收到了一份带有插图的清单副本, 以此为据去购买相同的艺术品。^[74] 他将 273 件艺术品带回圣彼得堡, 其中包括漆器、铜器、象牙、瓷器、石刻和木制品; 大部分仍然被保存在上述博物馆中。易拉奇还为新建的皇宫购置了一些漆器家具。^[75]

那时的皇宫中出现了由陶瓷、漆板和丝绸装饰而成的新“中式书房”。留存至今的一个例子就是彼得三世在奥拉宁鲍姆的小夏宫, 与缅希科夫的夏宫相距不远。彼得三世是彼得大帝之孙, 伊丽莎白之侄, 他在 1761—1762 年间统治了俄国一两年。他更有名的身份是叶卡捷琳娜二世 (1762—1796 年在位) 倒霉的丈夫, 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推翻, 不久之后被杀害。叶卡捷琳娜二世同样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十分感兴

趣。上述宫殿由里纳尔迪 (Antonio Rinaldi, 约 1710—1794) 设计, 这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建筑家致力于为俄国宫廷服务。宫殿在 1758—1762 年间建成, 饰有真正的中国瓷器以及来自俄国工匠弗拉索夫 (Fedor Vlasov) 及其工坊——该工坊致力于仿制中国漆器——的漆器。^[76] 宫殿餐室的墙壁由灰泥粉刷, 小搁板上陈列着大量瓷器。由此看来, 该宫殿仍然延续着 18 世纪初以来的传统 (彼得宫里私人小皇宫宫中的漆制风格书房)。圣彼得堡中几座巴洛克风格建筑的结构 (这种风格在当时的俄国非常流行) 让人想到中国的佛塔。这都证明了那一时期中国对俄国建筑的影响力。^[77]

18 世纪初以来, 俄国的艺术家致力于模仿那些昂贵的中国工艺品——漆器和瓷器。1735 年, 随行俄国商队出使中国的米亚斯尼科夫 (Osip Myasnikov) 的任务即为学习一些中国手工业方面的绝技。1743 年, 米亚斯尼科夫写下最后一份报告, 最近由波罗迪娜 (Bolotina) 出版。他写道, 虽然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 也购置了有趣的艺术品, 但是称不上非常成功。^[78] 1746 年, 俄罗斯工匠维诺格拉多夫 (Vinogradov, 1720—1758) 试作瓷器成功, 此后, 俄国就开始自主制作中国瓷器。1744 年, 皇家陶瓷工厂在圣彼得堡建立。然而, 第一件俄国陶瓷模仿的对象是欧洲而非中国艺术品: 那时, 德国和法国已经掌握了制瓷的奥秘。^[79] 同时, 俄国工匠在早期探索中尝试用本土材料模仿中国瓷器, 但是成品质量大打折扣。尽管如此, 这些尝试却促进了俄式瓷器的发展, 这在格热利 (Gzhel) 镇尤为明显。对于中国制漆工艺的模仿也促进了俄国漆画在那一时期的突飞猛进。

五、1762—1796 年俄国的中国艺术

18 世纪后半叶即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 俄国对中国艺术的迷恋有增无减。和该世纪前半叶相比, 后半叶延续了“中国风”的主要特征, 却又呈现出更加明显的思想方面的倾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德国籍的公主, 1745 年嫁给俄罗斯太子, 1762 成为女皇, 精通欧洲几种语言, 尤其喜欢法国哲学——当时主要由启蒙主义思想家主导。她与伏尔泰和狄德罗 (Denis Diderot, 1713—1784) 都有书信往来。我们都知道, 伏尔泰欣赏中国文化和政体, 而他对于这两方面的了解来自传教士作品。他还写过一些和中国有关的著作, 包括《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这是他对元杂剧《赵氏孤儿》所作的法文改编。伏尔泰的中国是理想化的, 他将中国形象与既定的政治理想联系起来。他将中国与欧洲对比, 从而批评当时法国的宗教、文化以及法国政府。^[80]

伏尔泰对同时期的俄国文化影响巨大。他对中国形象的描述也通过翻译传入俄国。^[81] 他的几部描述中国的书被翻译成俄文并在俄国出版。而且,《中国孤儿》(俄文为 *Kitaiskii sirota*) 在 1788 年被涅恰耶夫 (V. Nechaev) 翻译成了俄文 (采用韵文形式), 该戏剧在圣彼得堡多次公演: 18 世纪 80 年代的法语版本以及 1809 年由俄国著名剧作家沙尔科夫斯基 (Shakhovskoi, 1777—1846) 翻译的俄语版本。^[82] 在这些译本中, 中国的形象也与启蒙思想相结合, 因此二者进入俄国时, 采取的仍然是如在法国般的结合形式。

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阅读启蒙主义哲学家们的著作以及与同样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法国贵族交流而逐渐熟悉了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她经常在与欧洲朋友们的通信中提到中国, 这些

人包括伏尔泰、冯·格里姆 (Friedrich Melchior von Grimm, 1723—1807)、拉莫拉尔 (Charles-Joseph Lamoral) 以及德林王子 (Prince de Ligne, 1735—1814)。^[83] 1783 年, 叶卡捷琳娜二世写了一篇名为《费维王子的故事》(Skazka o tsareviche Fevee) 的东方童话, 主题与中国有关。这个故事为了她的孙辈而作, 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开明君主形象。1786 年, 该作品被改编成喜剧并在宫廷舞台上演。当然, 该作品的中国形象源于想象。叶卡捷琳娜二世使用的素材来自西方文学, 主要参阅的是法国启蒙主义者的作品。这部由俄国女皇创作的作品在西欧和俄国间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在 1784 年被翻译成德文、1790 年被翻译成法文出版。^[84] 叶卡捷琳娜二世还写了一部和中国有关的更为严肃的作品, 名为《中国思想》(Kitaiskie mysli)。这是一部格言合集, 模仿了中国思想家的著述。^[85]

那一时期, 俄国文人学者出版了不少和中国有关的书。^[86] 其中有对欧洲传教士作品的翻译, 也有早期俄国汉学家独创的作品: 列昂季耶夫 (Alexey Leontiev, 1716—1786) 和阿加福诺夫 (Alexey Agafonov, 1746—1792/1794) 是俄国驻北京东正教团里的学生, 先后学习了汉语和满语, 成了俄罗斯最早一批的汉学家。^[87] 18 世纪俄国启蒙运动的一大特征就是期刊种类和数量方面的增加, 它们刊载了很多译自欧洲语言的作品, 包括那些关于中国的文章。18 世纪三四十年代, 这些文章开始在俄国的期刊上出现, 但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亦即七八十年代, 它们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些文章谈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不同方面, 也言及中国艺术 (手工艺)。非舍曼的数据统计显示, 1731—1793 年间, 俄国期刊上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共计 50 篇, 其中有 8 篇涉

及中国的手工艺及工业技术。^[88] 这在出版文献中比重甚大, 仅次于描写中国政体的文章 (12 篇), 后者是那一时期对于俄国学者和作家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可以看出, 艺术问题于对 18 世纪后半叶的俄国读者来说有多么重要。普通的俄国读者也通过这些期刊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生活和文学, 并且和 18 世纪上半叶相比, 他们由此对中国时政也更为熟悉。

在期刊文章之外, 俄国学者也翻译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欧语书籍, 其中一些专门具体讨论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其中包括对钱伯斯 (Chambers) 的作品《中式花园》(Chinese Gardens) 的部分翻译 (1771), 内容涉及对中国“建筑、服饰、头饰、机器和工具”的描述; 以及对杜赫德的两卷本著作《中国及鞑靼地理、历史、纪年、政治、自然特征考》(Description of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Physical [Aspects] of Chinese Empire and Chinese Tartarie) 的翻译 (1774—1777)。^[89] 后者还包含详尽的地图和插画来描绘中国的风景以及艺术品。这本书显然对于那些模仿中国风格的俄国建筑与装饰艺术影响很大。道恩·雅各布森比较了俄国的“中国风”与同时期西方著作中的绘画后发现, 这一时期源自叶卡捷琳娜二世宫廷的中式建筑必然受到了英法相关书籍的影响。^[90]

此外, 中俄在 18 世纪后半叶继续在边境地区开展贸易。18 世纪 60 年代即叶卡捷琳娜统治初期, 俄国与清廷间由于一些未能解决的边境问题而存在几分敌意。1763—1768 及 1785—1792 年间, 由国家主导的贸易甚至还中断了一段时间。^[91] 1768 年, 中俄双方达成了新协议并恢复边境贸易, 恰克图成为此后中俄贸易的重镇; 自 1772 年始, 两国开展的合法贸易只能在

此地进行。^[92]然而,俄国女皇仍然对华贸易寄予厚望,希望能够恢复并扩展双边贸易。例如,在她统治初期的1762年7月31日,她宣布废除对华贸易的国家垄断,允许俄国商人在边境及中国境内开展民间贸易。^[93]民间贸易的合法化促进了中俄贸易的发展,中国艺术品从而在18世纪末继续被大规模地进口到俄国。

如上所述,俄国对中国风格的兴趣主要在宫廷中体现。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收集中国艺术品。^[94]在她现存于冬宫的收藏当中,有一套精致的中国银质掐丝梳妆用具,包括29件单品,可能在1740—1760年间于广州生产。^[95]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成为女皇之后,下令在圣彼得堡附近建造了几个中式风格的宫廷建筑。1763年,彼得宫夏宫大殿中的两间书房也在法国建筑家让·巴蒂斯特·拉莫特(Jean-Baptiste Vallin de la Mothe, 1729—1800)的主持下以相似的风格进行了装饰(分别在1767和1769年完成)。用来装饰这两个小房间的中国漆板取自若干从中国进口的屏风。^[96]然而,并不是所有用到的漆板都来自中国,门上、窗边和墙底的漆板均由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国工匠完成。这两个房间的装饰品还包括一些专门在中国购置、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品:陶瓷、铜制品、银器、象牙和景泰蓝制品。1944年,法西斯彻底毁掉了彼得宫大殿。尽管如此,一些珍贵的中国艺术品早在1941年就被保管员撤出了,而且这两个房间的装饰都在20世纪50年代被复原,因此当今之人才有幸目睹当年遗风,现在展示的丝绸板是战后的复制品。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彼得宫夏宫大殿中,有几个房间由丝绸板装饰。例如,彼得宫大殿的主卧(皇冠屋[the Crown room])的墙壁在1769—1770年间被德裔建筑师费尔顿(Yuriy M. Felten, 1730—1801)重新设计,这间屋的墙

即由中国丝绸板装饰。这些丝绸板的制作时间可追溯至17世纪末,上面的图案显示的是陶瓷制作的过程。^[97]它们在1941年法西斯侵略之前即被运送至苏联中部地区,并在战后重返夏宫。

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政时期的显著现象之一是建造了许多中式的宫苑和庄园,这在此前并不常见。俄国中式建筑的典例就是奥拉宁鲍姆的中式皇宫以及沙皇村里的中式村庄(均由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建造)。前者在1762—1768年由意大利建筑师里纳尔迪设计,他之前就有装饰中式宫殿的经验(参见前文)。虽然皇宫外部采用法式洛可可风格设计,但很多内饰仍为中式。该宫苑另一重要特点在于,若将其与之前建筑相比,它在中式风格方面产生了一定变化。虽然很多房间仍然遵从俄国长期以来的传统,采用进口中国艺术品(陶瓷、铜器和景泰蓝)做装饰,但是18世纪以来俄国非常流行的丝制和漆制墙板在这里却非常少见。相反,有几个房间由壁画装饰,还有两个特别的书房——墙上有着带玻璃珠的刺绣织物和用不同材料镶嵌的木板。尽管如此,这些房间的装饰内容还是在模仿中国艺术。人们可以看到,西方和俄国国内的大师们如何通过本土艺术技艺使用中式图案:他们为俄国的艺术形式增添了更多受到中式风格启发的图案和设计。负责装饰皇宫的画家——巴洛奇和司特法诺·特罗里兄弟(Barozzi and Stefano Torelli, 1712—1784)原籍意大利,但是皇宫中的很多装饰均由俄国的工匠创造。因此,这是不同国籍的艺术家们合作的成果,也体现了当时俄国艺术的国际特征。俄国艺术史家们很早就称赞奥拉宁鲍姆的中式皇宫为18世纪俄国建筑中的杰作——它将很多不同的风格和技法和谐地统一在一起。^[98]该宫里那些主要由意大利画家们创作出来的图案和设计,也影响了后来俄国的装饰艺术。人们可

以注意到,在中式宫殿里广泛应用的那些受中国艺术启发而来的几何图案和蔓藤花纹也出现在此后的俄国建筑中。奥拉宁鲍姆的中式皇宫也是俄国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中式建筑——战争期间,这里幸免于法西斯的蹂躏(他们没有攻占过这个城镇),这与圣彼得堡周边的那些沙皇夏宫境遇不同。

18世纪70年代,宫廷建筑师里纳尔迪和尼耶洛夫(V.I. Neelov, 1722—1782)设计了皇村夏宫公园内的中式建筑群,取名为“中国村”。其中包括模仿中国宝塔的塔楼——周围是供臣子休息的住处,可供游赏的亭阁,桥梁和花园(见图5)。该建筑群直到19世纪初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之后才完工。那里还有一个中式戏院(建于1777—1779年),它是18世纪欧洲中式建筑的少有范本。遗憾的是,它在1941年毁于法西斯之手,所以我们只能从20世纪初期的文字描述和图画中了解其装饰。这个剧院的外部设计非常低调,但是里面有很多珍贵艺术品。其中的包厢和阳台上由饰有龙和中国人形象的柱子支撑,还有同样取自中式设计的彩画、织物、鸣钟和珠子。^[99]这些装饰使用的是一些像纸板、混凝纸浆这类低廉的材料,却创造一个理想的中国形象——一个富而好礼、文化神秘的国度,这是一个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臣子都非常神往的形象。

同时,18世纪的俄国对中国艺术品的崇尚并不限于皇家宫廷。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臣子也效仿她,在自己的宅邸里建造中式厅堂、亭阁和花园。不幸的是,大多数都惨遭毁坏,今日全无。例如,波特穆金(Grigory A. Potemkin, 1739—1791)是叶卡捷琳娜时期的股肱之臣、男宠(也可推测认为他是女皇的秘密配偶),他在自己位于圣彼得堡的塔夫利亚宫(Tavicheskii dvorets, 1783—1789年为纪念打败土耳其、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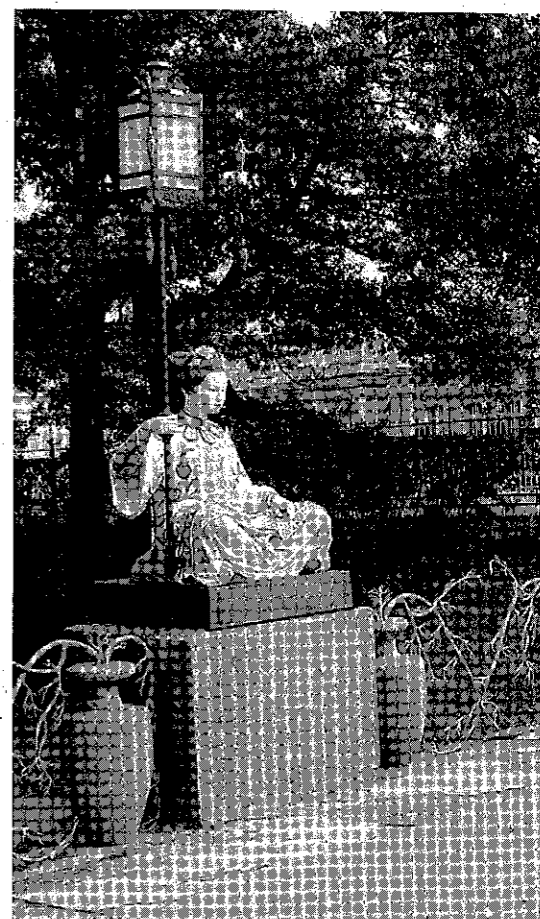


图5 皇村(Tsarskoe selo)的中国花园(约1779)

领克里米亚的胜利而建,在波特穆金死后由叶卡捷琳娜二世买下)里建了一个中式厅堂。其中装饰有中国的陶瓷像、丝绸画、屏风、灯笼和茶壶。他和当时其他贵族一样,特别爱收集中国艺术品。^[100]

陶瓷成为当时俄国显贵宅邸中的平常之物。这在当时俄国杰出诗人加甫里尔·杰尔查文(Gavril R. Derzhavin, 1743—1816)——他的创作风格影响了最著名的俄国诗人普希金(Alexander S. Pushkin, 1799—1837)——的诗中常有提及。杰尔查文不仅提到了陶瓷——可能来自中国也有可能来自西方(欧洲或俄国),也提到了中国与孔子。^[101]这显示出当时俄国上流社会对中国的普遍兴趣。

结语

由于篇幅所限,拙文难以一一列举所有那些17、18世纪间在俄国出现过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和中国风格的俄国本土作品。而分析那时中国艺术对俄国艺术的影响更是难上加难,拙文恐难完成。在此只是对中国艺术在俄国的早期传播情况、俄国之中国风的特殊性如何形成以及这两个问题的历史背景进行简单介绍。

我们可以看出,在17—18世纪间中俄关系发展史中,纯粹中国艺术及来自西方的中国风尚对于中俄关系发展是多么重要。像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些俄国的重要政治人物及其亲眷、臣子都在收集中国艺术品(大多是装饰品)并推动对华贸易和外交关系发展。中国艺术品的流行成为了两国保持和平贸易关系的重要原因,这一现象持续了几个世纪。保存在俄国的诸多来自17—18世纪的中国艺术品见证了一切。就俄国统治者而言,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往往不局限于物质层面,也体现在思想层面(特别是在18世纪后半叶);俄国学者逐渐对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发生兴趣。虽然中国风格得以在俄国出现和发展要拜西方所赐,但此种发展也有其内部原因:很早以来,对华贸易即为俄国经济之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从俄国那些最重要的中式建筑之史学脉络看出中国风格在18世纪的演变。中式房间的装饰有很多种,墙壁装饰包括:(1)丝绸和其他织物;(2)漆板;(3)购自中国、样式特别的丝绸板画;(4)壁画。第一种装饰的历史最悠久(可追溯至17世纪),也是整个18世纪最常见的一种。第二、三类显然在18世纪的早期出现,而在该世纪中后期继续发展。第四类则流行于18世纪后半叶。因此,“中国热”在俄国艺术中成为一种清晰的风格,并经历几

个阶段的发展,也存在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文献和材料,对中国艺术及文化对俄国的早期影响的研究还存在进一步问题。首先是艺术对宫廷及贵族群体以外的人的影响:中下级阶层如商人、军人和教士是怎么看待中国商品的?还有中国艺术对俄国传统手工艺的影响(同样在社会中下层流传)。这两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杜越洋译)

注释

*本文系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中国艺术在俄罗斯传播和中俄文化交流》(批准号:SDH31540011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对艾尔米他什博物馆馆员 Maria L. Menshikova (纳西科娃)为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协助谨致谢忱。

[1] Adolf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 A. Knopf, 1925; Hugh Honour,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New York: Dutton, 1962; Michael Sullivan, *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 From the XVI-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3; Madeleine Jarry, *Chinoiserie: Chinese Influence on European Decorative Art,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New York: Vendome, 1981; Thomas H. C. Lee, ed.,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Dawn Jacobson, *Chinoiserie*, London: Phaidon, 1993. 俄译本 Dzhekovson D., *Kitaiskii stil'*, Moscow: Iskusstvo - 21 vek, 2004, p. 90.

[3] 参见袁宣萍:《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设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深圳,海天出版社,2005;程庸:《国风西行: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三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4] Barbara W. Maggs, *Russia and "le rêve chinois": China in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Oxford: The Voltaire Foundation at the Taylor Institution, 1984, pp. 109-110. (中译见马基思:《十八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5] Fishman O. L., *Kitai v Evrope: mif i real'nost' (XIII - XV III vv.) (China in Europe: Myth and Reality)*, Saint Petersburg, 2003, pp. 403-405, 480-482.

[6] Ibid., pp. 480-481.

[7] Samoilov N. A., *Rossia i Kitai v XVII - nachale XX veka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17th - early 20th century)*, Saint Petersburg, 2014, pp. 189-202.

[8] Wu Yifang, "Kitaiskii cabinet" ("Chinese study"), in *Filosofskii vek, filosofii kak sud'ba, russkii filosof kak sotsio-kul'turnyi tip (The Age of Philosophy, Philosophy as the Fate, Russian Philosopher as the Socio-Cultural Type)*, Saint Petersburg, 1999, pp. 159-167; 吴奕芳:《俄罗斯艺术里的中国风尚:18世纪中国艺术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及作用》,载《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4(4),54-55页;李明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125-128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

[9] Benua N. A. and A. Uspenskii, "Kitaiskii dvorets v Oranienbaume" ("Chinese Palace in Oranienbaum"), in *Khudozhestvennye sokrovishcha Rossii (Treasures of Russian art)*, (10)1901, pp. 183-198; Ikonnikov A., *Detskoe selo: kitaiskii teatr i kitaischina (Detskoe selo [Pushkin]: Chinese theatre and Chinoiserie)*, Moscow: Leningrad, 1931.

[10] Arapova T. B., "Kitaiskie izdeliia hudozhestvennogo remesla v russkom inter'ere of the XVII - first quarter of the XVIII century (K istorii kul'turnykh kontaktov Kitaia i Rossii v XVII - XVIII vv.)" ("Chinese decorative art in the Russian interior of the 17th - first quarter of the 18th century: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contact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17th - 18th centuries"), *Trudy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Papers of the State Hermitage)* 27 (1989), pp. 108-116; Saverkina I. V., "Izdeliia v 'kitaiskom vkuse' v interierah petrovskogo vremeni (na primere dvortsov A.D. Menshikova)" ("Objects in 'Chinese

style' in the interiors of Peter the First epoch, with palaces of A.D. Menshikov as examples"), *Russkaia kul'tura pervoi chetverti XV III veka, Dvorets Menshikova, Sbornik nauchnykh trudov (Russian culture of first quarter of the 18th century, Menshikov's palace, Collection of research papers)*, Saint Petersburg, 1992, pp. 79-89.

[11] Arapova T. B., *Kitaiskie raspisnye emali: sobranie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Chinese cloisonné in the State Hermitage Collection)*, Moscow, 1988; Arapova T. B., Kudryavtseva T. V., *Dal'nevostochnyi farfor v Rossii, XV III - nachalo XXV., katalog vystavki GE (Far East Porcelain in Russia, 18th - early 20th centuries,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of State Hermitage)*, Saint Petersburg, 1994; Menshikova M. L., "China and chinoiserie," in *Treasures of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2000, pp. 201-244; *Kitaiskoe eksportnoe iskusstvo iz sobraniia Ermitazha, konets XVI - XIX vv. (Chinese export art in the Hermitage collection, end of the 16th - 19th centuries)*; Saint Petersburg, 2003; Menshikova M. L., "Yakov Vilimovich Brius i ego kitaiskie kollektsii" ("Yakov Vilimovich Brius and his Chinese collections"), in *Petrovskoe vremia v litsah (Figures of the Peter's epoch)*, Saint Petersburg, 2000, pp. 34-40; Menshikova M. L., "Iz istorii kitaiskikh kollektsii"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llections"), in *Osnovateliiu Peterburga: katalog vystavki GE (To the Founder of Petersburg,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of State Hermitage)*, Saint Petersburg, 2003, pp. 236-246; Menshikova M. L., "Kitaiskie kollektsii pri dvore v Peterburge i v imperatorskom Ermitazhe v XVIII v." ("Chinese collections at the court in Petersburg and in the Imperial Hermitage"), in *Sankt-Peterburg - Kitai, Tri veka kontaktov (Saint Petersburg - China: three centuries of contacts)*, Saint Petersburg, 2006, pp. 49-67; Menshikova M. L., *Kitaiskie eksportnye veera (Chinese exported fans)*, Saint Petersburg, 2004; Menshikova M. L., *Dragotsennaia filigran' Vostoka XVI - XIX vv. iz sobraniia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Precious filigree of the 16th-19th centuries in the State Hermitage Collection)*, Ekaterinburg, 2009, pp. 14-47.

[12] Bolotina N. Iu., "Edu ia dlia torgovogo svoego

promyslu: kitaiskie tovary v Rossii 18 veka" ("I travel on my trade business: Chinese goods in Russia in the 18th century"), in *Istoricheskii arhiv (Historical archive)* 2006, pp. 173-207.

[13] *Ru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v 17 veke (Russo-Chinese contacts in the 17th century)*, Moscow, 1972, vol. 1-2; *Ru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v 18 veke (Russo-Chinese contacts in the 18th century)*, Moscow, 1978-2011, vol. 1-3, 6.

[14] Skachkov P.E., *Ocherki istorii russkogo kitaevedeniia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sinology)*, Moscow: Nauka, 1975, pp. 14-15. (中译见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5] Gluhareva O., Krechetova M., *Pamiatniki iskusstva Kitaia v muzeiah SSSR (Chinese art objects in the USSR collections)*, Moscow: Gos. izd-vo izobrazitel' nogo iskusstva, 1959 [Intro., unpaginated].

[16] Kramarovskii M.G., *Sokrovischa Zolotoi Ordy (Treasures of the Golden Horde)*; Saint Petersburg: Slaviia, 2001, p. 5.

[17] *Hozhdenie za tri moria Afanasiia Nikitina v 1466-1472 gg. (Afanasiia Nikitin, Travel Over Three Seas, 1466-1472)*. ed. by B.D. Grekov and V.P. Adrianova-Perets (Moscow-Leningrad, 1948), p. 65. 俄罗斯至今仍称中国为“Kitai”。

[18] Gluhareva, Krechetova, *Pamiatniki iskusstva Kitaia v muzeiah SSSR*.

[19] *Ru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v 17 veke*, vol. 1, pp. 42-43, no. 2-3.

[20] On these missions, see the Russian monograph, Demidova N.F. and Miasnikov V.S., *Pervye russkie diplomaty v Kitae* ("Rospis" I. Petlina i "Stateinyi spisok" F.I. Baikova). (中译见娜·费·杰米多娃,弗·斯·米亚斯尼科夫:《在华俄国外交使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1] 该方面重要成果见 Maggs, *Russia and "le rêve chinois"*, pp. 62-63; Skachkov, *Ocherki istorii russkogo kitaevedeniia*, pp. 17-21。

[22] Demidova N.F. and Miasnikov V.S., "Pervye russkie diplomaty v Kitae," pp. 47-48.

[23] *Ibid.*, pp. 135-136.

[24] 巴依科夫用了北京在元朝的名称,可见当时俄罗斯人对元代情况的记忆挺深。

[25] Demidova and Miasnikov, "Pervye russkie diplomaty v Kitae," pp. 133-134.

[26] Maggs, *Russia and "le rêve chinois"*, pp. 66-67; Skachkov, "Ocherki istorii russkogo kitaevedeniia," pp. 23-26.

[27] Bantysh-Kamenskii N.N., *Diplomaticheskoe sobranie del mezhdru Rossiiskim i Kitaiskim gosudarstvami s 1619 po 1792 god (The collection of diplomatic documents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states between 1619 and 1792)*, Kazan, 1882, pp. 32-33.

[28] Gluhareva, Krechetova, "Pamiatniki iskusstva Kitaia v muzeiah SSSR."

[29] Menshikova M. L., "Kitaiskii shelk v Rossii v XVII-XVIII vv." ("Chinese silk in Russia in the 17th-18th centuries"), in *Shelkovi Put': 5000 let iskusstva shelka. Katalog vystavki (Road of Silk: 5000 Years of the Art of the Silk)*, Saint Petersburg: Slaviia, 2007, p. 52.

[30] Sladkovskii M. I., *Istoriia torgovo-ekonomicheskikh otnoshenii narodov Rossii s Kitae (do 1917 g.) (History of trad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peoples of Russia and China, before 1917)*; Moscow, 1974, pp. 94-95 (中译见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1] *Ru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v 17 veke*, vol. 2, p. 646.

[32] Bantysh-Kamenskii N.N. *Diplomaticheskoe sobranie del*, pp. 67-68.

[33] *Ibid.*, p. 74.

[34] 后来在18世纪,旅行日志被译成其他西文语言(包括俄语),见 Maggs, *Russia and "le rêve chinois"*, pp. 67-69。

[35] Izbrant Ides [Ysbrands Ides] and Adam Brand, ed. by Kazantsev, *Zapiski o posol'stve v Kitai (Records on the Embassy to China)*, Moscow, 1967, pp. 205-206. (中译见伊台斯、勃兰德:《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692—

1695)》,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6] *Ibid.*, p. 345.

[37] Sladkovskii, *Istoriia torgovo-ekonomicheskikh otnoshenii narodov Rossii s Kitae*, pp. 94-95.

[38] *Ibid.*, p. 115.

[39] *Ru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v 18 veke*, vol. 1, pp. 74-75, no. 22; pp. 86-87, no. 32.

[40] Sladkovskii, *Istoriia torgovo-ekonomicheskikh otnoshenii narodov Rossii s Kitae*, pp. 130-131, 139.

[41] *Ibid.*, p. 141.

[42] *Ru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v 18 veke*, vol. 1, p. 15.

[43] 该使团的历史及重要性,例见 Skachkov, *Ocherki istorii russkogo kitaevedeniia*, pp. 35-65; Nikolai Adoratskii, *Pravoslavnaia missiia v Pekine za 200 let ee suschestvovaniia*, Kazan, 1887; 中译见尼古拉·阿多拉茨基:《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迄于191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44] Sladkovskii, "Istoriia torgovo-ekonomicheskikh otnoshenii narodov Rossii s Kitae", p. 131.

[45] *Pis'ma i bumagi Petra Velikogo*, tom 1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Peter the Great*), Saint Petersburg, 1887, p. 240, no. 230.

[46] RGADA, *F. Kabinet Petra Pervogo, otd. II, kn. 7, ll. 522 ob. — 523*.

[47] RGADA, *F. 248. D. 14. L. 333-334*.

[48] *Ru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v 18 veke*, vol. 1, p. 97, no. 40; Bolotina N. Iu., "Edu ia dlia torgovogo svoego promyslu," p. 184.

[49] *Kitaiskoe eksportnoe iskusstvo iz sobraniia Ermitazha*, pp. 162-163.

[50] Shafranovskaia T.K., "Puteshestvie Lorentsa Langa v 1715-1716 gg. v Pekin i ego dnevniki" (Lorents Lange's trip to Beijing in 1715-1716 and his diary), *Strany i narody Vostoka (Countries and peoples of Orient)*, 1961, pp. 188-205.

[51] *Ru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v 18 veke*, vol. 1, p.

177, no. 133.

[52] *Ibid.*, vol. 1, p. 282, no. 158.

[53] *Ibid.*, vol. 1, p. 322, no. 195.

[54] Skachkov, *Ocherki istorii russkogo kitaevedeniia*, pp. 35-37; Maggs, *Russia and "le rêve chinois"*, pp. 73-75.

[55] 我在这里不展开讨论,因为它们都用外语写成,并且对18世纪初的俄国影响甚微。

[56] Shafranovskaia T.K., "Puteshestvie Lorentsa Langa v 1715-1716 gg. v Pekin," p. 204.

[57] Menshikova M.L., "Risunki kitaiskikh veschei iz sobraniia Kunstkamery Petra I" ("Pictures of Chinese objects in the collection of Kunstkamera of Peter the First"), in *Narisovannyi Muzei Peterburgskoi Akademii Nauk, 1725-1760 (Museum in paintings of the Peters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1725-1760)*, Saint Petersburg, 2003, vol.1, pp. 271-315.

[58] Menshikova M.L., "K istorii kitaiskikh shelkovykh shpaler kesy iz kolleksii Petra I"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ilk tapestries in Peter the First collection"), in *Soobsheniia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Bulletin of the State Hermitage)*, 2004, pp. 112-119.

[59] 中国“外销艺术”主要指西方人在中国定制的东西,它们经常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见 *Kitaiskoe eksportnoe iskusstvo iz sobraniia Ermitazha, konets XVI — XIX vv.*, p.6。

[60] Arapova T. B., "Kitaiskie izdeliia hudozhestvennogo remesla," p. 111; Menshikova M.L., "K istorii kitaiskikh shelkovykh shpaler kesy," p. 118.

[61] Saverkina, *Izdeliia v 'kitaiskom vkuse' v interierah petrovskogo vremeni*, pp. 79-89.

[62] RGADA, *F. 214, Op.1, Ch. 8, D. 5376*, 截至1733年。

[63] Bolotina, "Edu ia dlia torgovogo svoego promyslu," pp. 193-194.

[64] Menshikova, "Yakov Vilimovich Brius i ego kitaiskie kolleksii."

[65] Arapova, "Kitaiskie izdeliia hudozhestvennogo remesla," p. 115.

[66] Honour,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p. 116.

[67] Uhanova I.N., *Russkie hudozhestvennye laki 18-20 vv.* (Russian lacquer painting of the 18th-20th centuries), Saint Petersburg, 2009, p. 8.

[68] *Kitaiskoe eksportnoe iskusstvo iz sobraniia Ermutazha* pp.174-181.

[69] *Rus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v 18 veke*, vol. 2, p. 189, no. 64.

[70] Sladkovskii, *Istoriia torgovo-ekonomicheskikh otnoshenii narodov Rossii s Kitaem*, pp. 138-141. 另见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71] Sladkovskii, *Istoriia torgovo-ekonomicheskikh otnoshenii narodov Rossii s Kitaem*, pp. 143-144.

[72] Skachkov, *Ocherki istorii russkogo kitaevedeniia*, pp. 34-36.

[73] Menshikova, "Kitaiskie kollektsii pri dvore v Peterburge," pp. 57-58; Menshikova, *Dragotsennaia filigran' Vostoka XVI-XIX v.*, pp. 154-155.

[74] Shafranovskaia T.K., "Iz istorii kitaiskikh kollektsii Kunstkamer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llections of Kunstkamera"), in *Kul'tura narodov Zarubezhnoi Azii i Okeanii, Sbornik MAE (Culture of the peoples of Asia and Oceani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graphy)*, vol. 25, 1969, pp. 5-23.

[75] Menshikova, "Kitaiskie kollektsii pri dvore v Peterburge," p. 58.

[76] Uhanova I.N., *Russkie hudozhestvennye laki 18-20 vv.*, pp. 10-11.

[77] Fishman, *Kitai v Evrope*, pp. 480-481.

[78] Bolotina, "Edu ia dlia torgovogo svoego promyslu," pp. 193-194.

[79] Lansere A.K., *Russkii farfor. Iskusstvo pervogo v Rossii farforovogo zavoda (Russian porcelain: the art of the first Russian porcelain factory)*, Leningrad, 1968.

[80] Arnold H. Rowbotham, "Voltaire, Sinophile," *PMLA* Vol. 47, No. 4 (Dec., 1932), pp. 1050-1065; Adolf Reichwein,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 C. Powell trans.,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68; Allan G. Grapard, "Voltaire and East Asia (A Few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Humanism)," in *Cahiers d'Extrême-Asie* 1985, vol.1, no.1, pp. 59-70.

[81] Maggs, *Russia and "le rêve chinois"*, pp. 87-88, 91-92; Fishman, *Kitai v Evrope*, pp. 370-371, 389.

[82] Fishman, *Kitai v Evrope*, p. 389, n. 2.

[83] *Ibid.*, p. 380.

[84] Maggs, *Russia and "le rêve chinois"*, p. 87.

[85] *Ibid.*, pp. 99-100.

[86] Maggs, *Russia and "le rêve chinois"*, pp. 131-137; Fishman, *Kitai v Evrope*, pp. 368-394.

[87] Skachkov, *Ocherki istorii russkogo kitaevedeniia*, pp. 66-78.

[88] Fishman, *Kitai v Evrope*, p. 388.

[89] *Ibid.*, pp. 388, 390.

[90] Dzekobson, *Kitaiskii stil'*, pp. 170-171.

[91] Sladkovskii, *Istoriia torgovo-ekonomicheskikh otnoshenii narodov Rossii s Kitaem*, pp. 159-162.

[92] *Ibid.*, pp. 161-162.

[93] Bantysh-Kamenskii, *Diplomaticheskoe sobranie del*, pp. 310-311.

[94] Menshikova, "China and chinoiserie," pp. 201-244.

[95] Menshikova, *"Dragotsennaia filigran' Vostoka XVI-XIX v."*, pp. 66-91.

[96] *Pamiatniki arhitektury prigorodov Leningrada (Architectural monuments of Leningrad)*, Leningrad: Stroizdat, 1985, p. 356.

[97] *Kitaiskoe eksportnoe iskusstvo iz sobraniia Ermutazha, konets XVI-XIX vv.*, pp. 174-175.

[98] Uspenskii, "Kitaiskii dvorets v Oranienbaume," p. 195.

[99] *Ibid.*, p. 14.

[100] Bolotina, "Edu ia dlia torgovogo svoego promyslu," p. 177.

[101] Maggs, *Russia and "le rêve chinois"*, p. 131.

CONTENTS

PRINCIPLES OF SINOLOGY

- A Promising Future as a Present to the Past: Keynote Speech at the 4th World Sinology ConferenceXU Jialu..... 1
- The End of Western SinologyBenjamin HAMMER..... 8
- Comparative Classics and the Dialogical Nature of SinologyBenoit VERMANDER..... 15
- China's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Worldwide PerspectiveGuy ALITTO (USA) 24
- A Temptation for the West: Treating China as Symbol.....Ross TERRILL (USA)..... 37

HISTORICAL EXPLORATION IN SINOLOGY

- Exchange of Learning but Failed Encounter: Behind Challenges, the *Acta Pekinensia*,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Yves CAMUS..... 44
- The Jesuits and the First Great Age of Western Sinology.....Colin MACKERRAS (Australia)..... 63
- Why does the West Need "Wise Men" from the East: The Jesuit Invention of Confucius.....Dorothy FIGUEIRA (USA)..... 72

NEW IDEAS IN SINOLOGY

- The Persecuted German Sinologists in 1933-1945: An Absent Generation and a Long Expected List.....Mechthild LEUTNER and Martin LEUTNER (Germany)..... 79
- Bertrand Russell and *The Problem of China*.....Don STARR (UK)..... 95

RENOWNED SINOLOGISTS

- François Noël and Latin Translations of Confucian Classical Books Published in Prague in 1711.....Vladimír Liščák (Czech)..... 103
- Discovering Three New Peaks in the Sinological Himalayas: Presenting the Lives and Works of Iakinf (Nikita Y. Bichurin, 1777-1852), Séraphin